

---

---

# 評艾蘭《湮沒的思想—— 出土竹簡中的禪讓傳說 與理想政制》

Allan, Sarah. *Buried Ideas: Legends of Abdication and Ideal Government in Early Chinese Bamboo-Slip Manuscript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5. Pp. 386.

[中譯本] 艾蘭著，蔡雨錢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10月。396頁。

費安德（Andrej FECH）

香港浸會大學

龐琨譯

---

---

艾蘭的專著討論了近年出土的四篇文獻：郭店一號墓的〈唐虞之道〉，上博簡的〈子羔〉和〈容成氏〉，以及清華簡的〈保訓〉。從大量的戰國出土文獻中選擇這四篇的原因，是它們都討論了一個共同的話題，即權力轉移過程中合法的非世襲繼位。艾蘭教授並非第一次討論早期中國的權力更替及其兩種基本模式——世襲與禪讓，在其第一部專著 *The Heir and the Sage: Dynastic Legend in*

*Early China*<sup>1</sup>（中譯本：《世襲與禪讓：古代中國的王朝更替傳說》<sup>2</sup>）中，已經詳細地論述了這一問題。不過，她的早期著作主要依靠傳世文獻，近作則是基於新出土的先秦文獻，且這些文獻沒有可以對讀的傳世文獻。艾蘭的文章表明，傳世文獻中有關權力禪讓的記載傾向於支持世襲王朝的概念，而出土文獻中禪讓思想則罕見地對世襲制提出了嚴重的質疑。艾蘭認為，作為集權政府，一統中國的秦朝及其後的漢朝限制了當時的意識形態，以壓制禪讓思想視為世襲制的潛在威脅，故自茲以降，來自禪讓思想的質疑便消失了。先秦時期有著關於權力正統性的生動思想論述，通過研究相關竹書文獻，我們得以重塑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湮沒的思想》一書共分八章。在第一章「導論」中，艾蘭簡要介紹了前舉四篇出土文獻，並提出該書的兩大主旨。一是從哲學角度，探索新發現的文本如何影響我們理解中國古代政治哲學的發展。二是從文獻的角度，使讀者了解這些類型的文獻，以及簡文的釋讀、出版等相關問題。基於此種目的，作者在隨後的章節提供了每篇文獻的譯文，並將它們放在各自的歷史語境和哲學脈絡下進行討論。

第二章「歷史與傳說」闡明了艾蘭對古代中國權力

1 Sarah Allan, *The Heir and the Sage: Dynastic Legend in Early China*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81).

2 艾蘭 (Sarah Allan) 著，孫心菲、周言譯：《世襲與禪讓：古代中國的王朝更替傳說》（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轉移問題的理論立場。在她看來，朝代循環的概念是中國傳統特立於其他文明的重要特質，這種概念可以一直追溯到周代。與此相應，每個朝代都由賢德之人創立，經過幾代世襲繼承，最終葬送在墮落的子孫手中。末代君王的惡行使得上天能夠合理將統治權移交於另一家族的賢人，此人正將是新世襲王朝的開創之君，而這個王朝則又會終始循環一如前朝。這樣一來，朝代循環的概念就體現了兩種互為牴牾的價值觀：以德為治還是權力世襲，或者換句話說，忠於國家還是忠於宗族。然而，隨著過去的一些諸侯在各自封地內大膽稱「王」，周朝的政治地位逐漸衰落，朝代循環的觀點很難再站得住腳，因為推翻式微的周廷將不再導致新朝代的建立。作者認為，這個問題正是中國哲學最富成果、最激動人心的時期之核心所在。

在這種情況下，禪讓權力予最為賢能之人的思潮第一次出現了。艾蘭認為，這種思想來自於當時新興的「士」階層，他們承續了貴族的血脈，但並非嫡子，亦無土地。這個受過良好教育的階層強調應當任人唯賢，亦是湧現哲學家的沃土。顧頡剛（1893–1980）認為禪讓傳說是由墨家後學創造的，但艾蘭持不同意見，她將這些傳說歸因於孔子的形象。彼時的孔子聲名鵲起，一躍而為當時最卓越的哲學家，他的德行被公認超越任何君王。她認為，這四篇文獻很可能是始皇帝焚書政策的犧牲品，因為它們的特徵恰符合他的法令。艾蘭接著討論早期中國文學遺產史上的另一大事件——漢代以新的標準化書寫重構先秦遺書——並分析所涉及的標準和工作。這種重構往往相當於

重新書寫原文，有時是因為需要修改原文中的字，有時則是因為要改變原來的文體。

第三章「楚文字竹簡」談及將單篇流傳的抄本彙編成大規模、多章節文本的趨勢。艾蘭認為，這種趨向或許是因為用於書寫的物質材料發生了改變。由於文本最初是記錄在木牘或竹簡上，其規模和長度也不免受到限制，而從漢代某個階段，人們開始使用長卷絲綢書寫，故可以容納更多內容，能將多個文本整合在一起。因此，使用絲綢是催生大規模、多章節文本的關鍵步驟。我認為，這個假設尚需更多的證據才能令人信服，這一點後文再談。該章節隨後對郭店簡、上博簡、清華簡等多宗出土文獻的多個議題進行了頗具啟發性的討論。例如，在上博簡部分，作者除了介紹其內容，還討論了竹簡的獲取情況、其所屬墓葬的可能位置、墓主人的身份等問題；清華簡部分亦細緻如斯。此外，艾蘭還全面介紹了出土文獻在出版上的諸多困難，並詳述了出版流程中涉及的各個階段。她接著針對上博簡和清華簡真實性的一些質疑和問題作出回應，因為這兩批竹簡並非通過考古發掘獲得，而是購自香港文物市場。為了釋疑，艾蘭明確回答道：「任何人都不可能具有偽造它們所必須的廣博的傳世文獻知識、古文字學能力及創造性的想象力。事實上，最能證明這些文獻真實性的理由大概就是，無論是單個的文字還是思想的發展，它們在方方面面都與各種早期傳世文獻及銘文材料（包括金文和甲骨文）具有複雜的關聯性。」（頁 70；頁碼為英文原著，下同。）

第四章「崇尚禪讓」討論的是〈唐虞之道〉，這篇文章在一座約公元前 300 年的楚墓中出土，收錄於 1998 年出版的《郭店楚墓竹簡》<sup>3</sup> 中。本章還設定了框架和方法，以便處理艾蘭所挑選的其他文獻。艾蘭首先介紹竹簡文本，然後提供該段文本的英譯全文，接著進行文本細讀，並分析其主要概念和主旨，包括該文本對禪讓話題的立場。在章節最後，艾蘭給出了簡文的英譯及中文釋文的對照。作者還嘗試根據她本人的解讀重排某些簡支的順序，亦提供了一些與其他學者不同的文字釋讀意見，而在每次艾蘭都闡明了其解讀的優點。有一點非常重要，她將文本分為不同的主題單元，同時也給出了原始簡號，便於與其他出版物交叉引用。

〈唐虞之道〉是一篇哲學論文。文章認為，禪位於賢是「聖」與「仁」的極至，它在任何歷史時期都是保障良好統治的最佳方法。這種權力轉移的形式被認為是調解「尊賢」與「愛親」這對矛盾概念的唯一手段，並且對國民大有裨益。艾蘭的結論是，即便不是〈唐虞之道〉這篇特定的文章本身，其包含的論證在早期中國也有很大的影響力。《孟子》、《荀子》甚至《韓非子》對待禪讓的態度，都可以視作對這個觀點的回應。

第五章「〈子羔〉與早期儒家的性質」與第六章「〈容成氏〉：禪讓與烏托邦想象」分析了上博簡中的兩篇文章，均收錄於 2002 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3 荆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 年）。

《貳》<sup>4</sup>。一般認為，這兩篇文獻的寫作年代下限為公元前 278 年。與哲學論著〈唐虞之道〉的體裁不同，〈子羔〉由孔子與其弟子子羔之間的對話構成。不過，〈子羔〉篇描繪了夏商周三代始祖的超自然孕生，從而使該文獻與其他儒家文獻區分開來。艾蘭認為，〈子羔〉篇的主要議題是如何對照聖人舜的賢德（正是這種「德」令他獲取了天下的統治權）來評價超自然孕生的三代始祖。此外，文本中的舜與孔子之間還存在著內隱聯想，因此後者聲稱「在〈子羔〉中，具有超自然性的三代始祖如果生活在同一時代，都將會效命於舜。這一論斷很容易讓人想到，最應成為統治者的當代聖人就是孔子本人」（頁 167）。〈子羔〉篇也因此佐證了艾蘭的論點，即孔子對禪讓傳說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容成氏〉是迄今發現的篇幅最長的楚文獻，從敘述史的角度討論禪讓制。與《莊子》中對原始烏托邦及其（被人類文明的創造者）毀滅的描述略為相近，〈容成氏〉也將歷史描述為從最初的烏托邦和諧中不斷衰退的過程，而和諧的主要特徵之一就是讓位於賢。文章不太關注「天命」的概念，而將禪讓視作宇宙與社會和諧的表徵。艾蘭總結道：「在文獻上和哲學上，該篇簡文都與傳世典籍中的戰國諸子學說有各種各樣的關聯，但它傳達的訊息卻與其中任一都不相符。」（頁 222）

第七章「〈保訓〉：得中而成王」討論了 2010 年出版

4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的《清華簡大學藏戰國竹簡》第一輯<sup>5</sup>中的一篇短文獻。該輯所錄文獻年代定位在公元前305年，前後誤差30年。這就是說，艾蘭書中所討論的四篇文獻時代相近。〈保訓〉篇的體裁是「訓」，並且聲稱具有確切歷史記錄的權威性。〈保訓〉意在記錄文王臨終前給他的兒子發——也就是將要履極的武王——的遺言。這段文本最著名的大概是引入了「中」作為禪讓的關鍵概念。學界已從哲學、法學、政治學等角度對這一概念進行過剖析，<sup>6</sup>艾蘭則引入了地理學的闡釋角度，將「中」確定為今河南省的嵩山一帶。因此，她從宇宙觀的角度解讀禪讓，暗示權力會轉移到該地區的人手中。顯然，我們有理由對這種主張持懷疑和保留態度。根據《史記》，處於嵩山附近的洛陽確實被認為是天下之中。<sup>7</sup>然而到了戰國時期，儘管洛陽仍舊掌握在垂死的周王廷手中，但這種地理區域的佔有已不再代表它可以凌駕於其他諸侯之上。在這個例子中，我更為認同劉光勝的觀點，他主張文本中存在數個不同的「中」的概念，包括一個哲學概念。<sup>8</sup>

在第八章「餘論」中，艾蘭首先回顧了在二十世紀中

5 朱鳳瀚：〈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概說〉，《文物》2011年第6期，頁55。

6 關於對〈保訓〉裡「中」這一概念的不同解讀，參 Liu Guozhong *Introduction to the Tsinghua Bamboo-Strip Manuscripts*, trans. Christopher J. Foster and William N. French (Leiden & Boston: Brill, 2016), 139–44.

7 《史記》，卷四，頁133。

8 Liu Guozhong, *Introduction*, 144.

國研究領域的發展背景下，她對禪讓問題的研究討論。她尤其強調了法國結構主義學者，如列維·施特勞斯，對其研究方法的影響。隨後，她回到這本書涉及的四篇文獻，總結了它們的共性與區別，並最後重申孔子的人格「對堯舜治下理想國之禪讓傳說的發展，甚至對於那些並非他追隨者的人來說，都提供了重要啟示。」（頁 327）。

儘管這部專著頗具啟發性，我對艾蘭的一些觀點還是持懷疑態度。第一點，雖然此為嘗試性，但她假設我們今日所知的多章節文本之所以產生，是因以絲綢為書寫載體而導致。首先，遠在秦統一六國之前，絲綢就已經被用作書寫材料。<sup>9</sup> 因此，多章節文本持續穩定地出現，似當由更多的因素造成，而非僅僅因為絲綢的應用。艾蘭認為漢代學術官僚化是其中一個因素，這我當然同意。但是她認為文獻定本會先寫在絲綢上，然後保存於宮廷秘府，這點仍然缺乏證據。我們知道，漢代秘府中一些建朝 200 年以後的文獻仍然是寫在竹簡上的。<sup>10</sup> 此外，即便是主要與早期中國文本的傳寫有關的事件，亦即秘府的官員劉向（前 79–前 8 年）和劉歆（前 46–23 年）所做的文獻編輯，也是抄寫在竹簡而非絲綢上。在解釋郭店簡三種《老子》殘簡以及馬王堆《老子》帛書的時候，艾蘭「絲綢假說」的缺

9 見於《墨子》。詳參 Liu Guozhong, *Introduction*, 6。

10 Edward L. Shaughnessy, *Rewriting Early Chinese Text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2; Matthias L. Richter, *The Embodied Text: Establishing Textual Identity in Early Chinese Manuscripts* (Leiden & Boston: Brill, 2013), 5.

陷尤為明顯。馬王堆《老子》帛書與傳世《老子》在內容上幾乎完全一致，代表了文本演變較晚時期的形態，而與傳世本的相似度只有三分之一的郭店殘簡，反倒可以追溯到文本形成的較早時期。艾蘭的假設前提是：《老子》文本的生成是將內容相關的材料整合在一起，直到一個「定本」出現，才最終以帛書的形式出現。這個觀點有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目前最完整的《老子》出土文獻——北大簡《老子》，只比馬王堆文獻的年代晚了幾十年。<sup>11</sup>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點，這個觀點意味著，郭店簡的特定彙編在幾十年後被一字不差地編入「五千言」的流傳版本。對此，儘管目前有很多看法，我還是認同裘錫圭與顧史考（Scott Cook）的說法，即，這樣一種假設顯得「令人難以理解，且巧合過甚因而難以採信」。<sup>12</sup> 哪怕考慮到《太一生水》可能與郭店《老子》丙篇合編一冊，這種情況也不會改變。依我看來，目前的學術成果無法證明帛書的抄寫對早期中國多章節傳世文獻的出現有何影響。

書中另外一個可能引起爭議的問題是，艾蘭主張，孔子在禪讓觀的生成方面發揮莫大作用，「甚至那些並非他追隨者的人」也因此受到啟發。正如我們在〈子羔〉篇

11 朱鳳瀚：〈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概說〉，《文物》2011年第6期，頁55。

12 兩人的觀點皆見於 Scott Cook, *The Bamboo Texts of Guodian: A Study & Complete Translation* (Ithaca: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2012), 204–5。

中所見，孔子僅與禪讓典範之一——舜帝有暗示性的關聯，畢竟孔子之名在這篇文獻中只被提及一次。至於其他文獻，其中一些如〈容成氏〉，幾乎沒有提及任何儒家的特定價值觀，譬如「仁」。因此，我們似乎只能這樣說，孔子的影響僅限於那些提及他的名字或美德的文獻，而在其他的情況下，這種說法則顯得有些牽強附會。

綜上，《湮沒的思想》雖然主要在於探討非繼承性權力轉移的話題，但同時也提供了大量關於出土簡帛竹書文獻研究的資料。毫無疑問，這部著作對有志於早期中國思想研究的學生將大有裨益。除了艾蘭所分析的這些文獻，其他出土文獻如北大簡（《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的〈周訓〉在西漢禪讓問題上亦將發揮重要作用。「湮沒」的思想出土日多，而《湮沒的思想》將注定會是這段奇妙思想旅程的里程碑。